

毛澤東與 中國文化



汪澍白 著

中華書局



10072

毛澤東與 中國文化



汪澍白 著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危丁明

毛澤東與中國文化

□

著者

汪澍白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坑福道5B-5F 2樓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10號

益高工業大廈12樓B座

□

版次

1993年12月初版

©199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173 3

序

一九九〇年，拙著《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基因》問世，它收集了八十年代文化討論中所寫的一批論文，中心是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關係問題。由於我研究毛澤東從早期入手，因此，書中論及毛澤東早期思想的比重較大，中期、晚期的論述顯得相對薄弱。一些朋友讀過以後，勸我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努力，按歷史順序就毛澤東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作較為系統的考察。現在獻給讀者的小書，正是爲此而作。

全書共分四章：第一章湖湘毓秀。主要是交代產生毛澤東這一歷史巨人的文化背景。第二章早期心影。以樸實的筆觸，描繪他的家世與家庭影響；六年舊學與七年新學；以及青年毛澤東在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薰陶下所形成的早期文化觀念與文化性格。第三章成熟的範式。毛澤東在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以後，憑藉他的革命實踐與文化素養，開創了一條中國式的革命道路。從文化的視角來看，也可以說是開創了某種獨特的文化範式。本章以延安時期爲中心，抓住思想路線（「實事求是」）、軍事路線

（「兵家韜略」）、理論基礎（「兩論」）三大環節，對毛澤東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展開了縱橫屈伸的分析。第四章前進與回歸。建國以後，毛澤東急於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但卻忽視了肅清封建遺毒的重要性，這樣就使得封建文化的深沉積澱，得以在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下潛滋暗長。這種在小農和封建基礎上形成的文化傳統與歷史情性，正是毛澤東晚年導演的「大躍進」與「文革」悲劇的文化背景和深層根源。

認真考察毛澤東與中國文化互相滲透互相轉化的矛盾關係，既反思中國的古老傳統，也反思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曲折演變過程及其所形成的新傳統，這是我們今天研究中國文化問題和進行文化重構的出發點。這個課程是極為重要的。但難度也很大：資料難得，立論難準，許多研究工作者知難而退。我固深知其難，但又覺得這一課題是不容迴避的，故不揣謏陋，這本小書，拋磚引玉，寄希望於來者。

汪澍白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於廈門大學白城之觀海樓

目錄

序	1
第一章 湖湘毓秀	1
第一節 今古異勢	2
第二節 楚材蔚起	7
第三節 獨立根性	11
第二章 早期心影	19
第一節 私塾發蒙	20
第二節 崇拜康梁	28

第三節	探求「宇宙之真理」	37
第四節	聖賢創世觀	50
第三章	成熟的範式	61
第一節	危機與選擇	62
第二節	知行觀與矛盾論	73
第三節	「實事求是」	82
第四節	兵家韜略	93
第四章	前進與迴歸	105
第一節	菊香書屋	106
第二節	古為今用	121
第三節	以亂求治	145

第一章

湖湘毓秀



第一節 今古異勢

在中國古代史上，湖南開發較晚。《禹貢》分天下爲九州，湖南屬荊州南境。春秋戰國屬楚，荆楚雖則兵力強盛，疆域遼闊，但中原王朝仍視之爲荆蠻楚蠻。秦始皇混一六國後，爲了高度集權，廢棄分封，實行郡縣制，分全國爲三十六郡，其中有長沙郡與黔中郡。漢以後，郡縣設置，代有變更。及唐廣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置湖南觀察使，自是始立湖南之名。迄清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四年）置湖南布政使，設四道（長寶、常岳澧、辰沅永靖、衡永郴桂），轄九府（長沙、寶慶、岳州、常德、辰州、沅州、永順、衡州、永州），基本上確立了今日湖南地理區劃的輪廓。

湖南之疆域，位在北緯三十度八分至二十四度三十八分，與東經一百〇八度四十七分至一百一十五度十五分之間，居長江中游，洞庭湖以南。東鄰江南，南接兩廣，西連川貴，北通湖北。面積二十萬四千三百二十八平方公里。人口總數一八九三年爲二千一百萬零九千，一九七六年爲五千零五十六萬八千一百。以漢族爲主體，少數民族有苗、土家、侗、瑤、回、維諸族。

湖南之地勢呈鍬鏟形，北面濱臨洞庭，地勢低平，東南西三面高山環抱，形同天然

屏障。氣候溫和濕潤，加之有湘資沅澧四水匯集洞庭湖而北注長江；濱湖及四水沿岸的沖積平原土質肥沃，宜於發展農業生產，丘陵山地則森林密布。「南嶽」衡山，層巒疊嶂，盤紆數百里，終年翠綠，自古爲南方名勝。岳麓山矗立於長沙市之西岸，碧嶂屏開，秀如琢玉。岳麓書院設立山下，自宋至今，千年弦歌不絕，門前懸掛一聯：「惟楚有材，于斯爲盛。」

宋以後，由於黨項、遼、金和蒙古族的相繼南侵，迫使以漢族爲主體的中原王朝將重心移向南方。南移的樞紐雖在江浙，湖南的開發也得到相應的推動。宋熙寧開梅山，即開發了今安化、新化一帶，使原來爲少數民族聚居的湘中地區實現了漢化。

宋、元、明、清改朝換代，湖南屢遭兵燹，人財俱損。但江西等地的外來移民陸續移入，補充了勞動力，促進了文化交流與經濟發展。到清康熙年間，便出現了相對安寧的局面。特別是洞庭湖周圍，隨着圍湖墾殖的面積迅速擴大，糧食產量劇增。過去民間流傳「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到康乾時，便流行起「湖廣熟，天下足」的新諺。長沙、湘潭、岳州、常德等城鎮，成爲日益興旺的米市；手工業、商業也跟着繁榮起來。至咸豐、道光年間，進而出現了文教昌盛的局面，爲人才成長準備了一定條件。

在古代，湖南人物幾乎不見經傳。獨有屈原放逐、賈誼貶謫至此而爲人們所關注，因而杜甫詩有「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句，提起湖南，就令人爲屈原而傷心落淚。

這種淒涼的景況直到近代才洒然一變。據南京大學歷史系編的《中國歷代名人辭典》收入歷代名人三千七百五十五人，鴉片戰爭以前三千零五人中，籍隸湖南者僅二十三人，只佔同期名人的百分之零點七七，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收入七百五十人，其中隸屬湖南籍者達七十五人，佔同期全國名人的百分之十；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史詞典》，其中收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名人八百一十九人，籍隸湖南者九十五人，佔同期全國名人百分之十一強。從上述兩項簡單數據，亦可略見湖南人在中國近代史上之地位有日臻顯赫之趨勢。

近年學術界對近代湖南人才蔚起的原因展開了相當廣泛的討論。有的學者強調幾度移民對更新血源和提高人口素質的作用；有的從文化源流、學風士氣方面作出解釋；也有的主張以政治鬥爭為中心樞紐。討論中，新見迭出，有助於對問題取得較為客觀全面的認識。但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首先要看到海通以後，湖南在中國的地位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太平軍起事以後，湘軍的崛起，對滿漢勢力的消長和湘楚人才的湧現是一個重要契機。

從中國古代史來看，威脅中原王朝的外患，大都來自塞北。南方的少數民族雖然也掀起過動亂，但鮮能問鼎中原。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威脅才轉為由南向北。英軍浮海入侵，首先攻掠廣州，然後才沿海北上，叩關京津。廣東頻臨南海，得西洋風氣之先。花

縣落第生洪秀全從傳教士那裏讀到崇上帝、排儒教的《勸世良言》，從中吸取了西方基督教非聖批儒的思想內容，使之同中國歷史農民運動所提倡的樸素平等觀念相結合，便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

一八五一年初，洪秀全首先發難於廣西桂平金田村，第二年春天就從永安突破清軍的包圍，率師進入湖南，迅速佔郴州、克益陽、渡洞庭、過岳州，直搗武昌。此時江華人朱洪英發動天地會起事，轉戰湘桂粵三省，廣大貧苦農民投入太平軍者更衆。一八五三年春，洪秀全統率大軍五十餘萬，水陸兩路沿長江東下，下九江，佔安慶，一舉攻克金陵，於是太平天國定都於此，更名天京，形成與清廷南北對峙的局面。

在太平軍的猛烈攻擊下，駐防各地的八旗綠營一觸即潰，清廷於是詔令興辦團練。一八五三年，丁憂回鄉的曾國藩被任爲湖南團練大臣。曾氏以衛道護教相號召，依憑鄉誼、戚誼與師友關係作紐帶，建立一支以强悍著稱的「湘軍」。在與太平軍的長期鏖戰中，湘軍雖在靖港、湖口等地屢有敗績，但敗而未潰，力量還在不斷增長。碰上太平軍因楊韋內訌而大大削弱，曾氏遂得以趁機整頓和擴大隊伍，進兵天京。

清朝由滿族貴族集團掌權。他們對漢族知識分子雖多方籠絡和利用，但又唯恐其攘奪自己的權力。從人關到太平軍興起前，清中央的軍機大臣、內閣學士、六部尚書，滿漢各佔一半，但實際權力盡操滿員手中。至於軍權，八旗綠營，全由滿人統領。太平軍

起事以後，先後派賽尚阿等爲欽差大臣，領兵鎮壓，卻都不堪一擊。在岌岌可危的情勢下，清廷出於無奈，才讓漢族官紳組織團練，試圖共挽危局。

在各地團練中，以曾國藩的湘軍最爲強盛，清廷對他既寄予厚望，又深懷戒心。湘軍在省內初獲成功，咸豐皇帝奕譚就詔令湖廣總督台湧和貴州提督佈克慎加以監視。一八五五年，曾國藩率部出省作戰，一舉攻克武漢，捷報傳到北京，奕譚欣然加批慰勉，並任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軍機大臣祁寯藻從旁進言：「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也。」奕譚反覆思量，便又狐疑滿腹，從此不敢委曾氏以地方督撫大權。一八五七年曾氏奔父喪回籍，奕譚准其在籍守制，讓這位功高震主的儒將閒置了一年多。後來雖起用他辦理浙江軍務，但官銜仍是兵部侍郎，位卑職小，遇事掣肘。當時的湘軍、淮軍雖然是抗擊太平軍的實際主力，但卻安排在天京外圍，而一些顧預無能的滿員則受命組建江南、江北大營，蓋冀其能就近攻取天京，俾免首功傍落。直到一八六一年奕譚死後，慈禧太后那拉氏垂簾聽政，她審時度勢，一上台便任命曾國藩統轄蘇、皖、贛、浙四省軍務，不久又加協辦大學士銜，並照准曾國藩的奏本，任免了一大批地方官。自此以後，湘軍集團便上升爲統治者當中最大實權派。清朝的權力中心自滿族貴族集團向漢族官紳轉移，這是一個轉捩點。攻破天京以後，曾國藩忍痛自裁湘軍，以釋清廷疑慮，繼而奉命剿捻受挫，清廷更

有意抬舉李鴻章，使湘淮分流，便於分別加以控制和利用。不過，湘軍諸將早已分散各方，擁軍自重，頗有尾大不掉之勢。

曾國藩雖於一八七二年鬱鬱而終，但地方實力派的勢力卻有增無已。以「扶清滅洋」相號召的義和團興起後，八國聯軍攻掠北京，兩廣總督李鴻章，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袁世凱，宣布東南互保。這件事清楚地表明，地方軍閥已經雄據沿海半壁，公然與中央抗衡。這同曾氏隱忍避嫌的時代，已是形勢迥異了。論者王德虎，在其《曾國藩之民族思想》書中早已指出：「湘軍演變而為淮軍，淮軍演變而為北洋軍，湘軍崛起為滿漢勢力消長之關鍵。」演變到辛亥「反正」時，武昌義旗一舉，各地大都傳檄而定，易如反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因為地方實權大都已掌握在漢人的手中了。

第二節 楚材蔚起

湘軍的崛起，其直接作用是撲滅了太平軍，暫時緩解了清王朝的統治危機。但從長遠來看，卻是為清朝的覆滅培植了掘墓人。掘墓人也有兩支：其一是統領湘軍、淮軍與北洋軍閥的漢族官僚。他們既是鎮壓太平軍的主將，又是洋務運動的首倡者，形勢的發

展使他們的後繼者——北洋軍閥得隴望蜀，從分享權力逐漸演變為覬覦最高統治權，其二是甲午海戰慘敗以後，奮起救亡的新人。特別是在湖南，湘軍諸將創立的基業，轉化而為下一代「修學儲能」的有利條件。他們一旦羽毛豐滿，便會乘時御風，與祖輩分道揚鑣，成為戊戌維新與辛亥革命的先行者。

維新運動的首倡者是南海康有為，而激進派代表譚嗣同、唐才常都是湖南人。在他們的倡導下，創建南學會和時務學堂，延聘梁啟超來湘講學；舉辦《湘報》《湘學報》，以造成輿論；一時在知識分子中形成一股強烈要求維新變法的激流。湖南下層社會的秘密會黨很多，特別是湘軍士兵解甲歸田以後，許多人參加了哥老會，一旦時局有變，這些人就會揭竿而起。譚嗣同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但他平日關心民間疾苦，與下層會黨也能互通聲氣。上中下三層勢力的互動，遂使原先趨向保守的湖南在維新運動中先着一鞭，成為「全國最富朝氣之一省」。

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緒皇帝載活「下詔定國是」，召譚嗣同進京任軍機處章京，參與新政事宜，及慈禧發動政變，有人勸譚嗣同逃往日本。譚嗣同不從，慷慨陳詞：「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中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在他從容就義以後，唐才常繼之因組建自立軍而殉難。他們無私無畏、前仆後繼的犧牲精神給維新運動寫下了不朽篇章，對辛亥革命和五四時代的革命者

都產生着深刻的影響。

辛亥革命的首領孫中山是廣東香山人，他以兩廣為戰略重點，組織了多次武裝起義。而繼起者則為湖南人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組建的華興會。華興會一九〇三年成立於長沙，以留日學生為主導。一九〇四年聯絡會黨首領馬福益等準備發動長沙起義。事敗之後，黃興等聚集東京，與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章太炎為首的光復會「合成大團」，於一九〇五年共建「中國革命同盟會」。公推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庶務，協助領導工作。一九一一年，黃興指揮黃花崗起義，烈士們用鮮血澆旺了革命的烈火，兩湖地區的鬥爭，更呈烈火燎原之勢。同年十月，武昌首舉義旗，湖南聞風響應，然後全國景從。湖南志士蔣翊武、譚人鳳等直接參與策劃武昌起義，黃興兼程趕赴前線，受命為戰時總司令。在長沙則有焦達峯、陳作新等組成以革命黨人為主體的湖南軍政府，並迅速調集新軍北上支援武昌。焦陳雖為敵對勢力乘虛殺害，但他們對革命忠誠的奉獻精神卻給後來者以很大的激勵。

五四時期陳獨秀、李大釗既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又是首倡馬克思主義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先導。湖南的毛澤東、蔡和森則為後起之秀。他們創辦新民學會，發動留法勤工儉學。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全國赴法青年一千六百餘人，其中籍隸湖南者四百餘人，佔四分之一強。毛澤東一邊推動出國留學，一邊悉心研究中國國情。在中國共產

黨建立初期，他深入工礦和農村工作，使湖南的工農羣衆運動空前高漲，有力地支援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以後，他更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文化傳統和革命實踐的結合；首創井崗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式革命道路。湖南的知識分子和工農羣衆一批又一批地參加了他所領導的革命隊伍，在戰鬥中茁壯成長。一九四九年建國時，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五十二名領導人中，籍隸湖南者十人，一九五五年頒定軍銜，元帥十人湖南籍三人；大將十人中有六人是湖南籍；上將五十七人中湖南籍十九人。「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些出將人相的英雄，正是在艱苦鬥爭中磨練出來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鴉片戰爭至今已一個半世紀，湖南人才蔚起，至毛澤東而稱極盛。毛氏的《沁園春·雪》中寫道：「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古代帝王已被滾滾洪流席卷而去，新時代的英雄人物合當應運而興。毛澤東創大業，開新統。就主觀方面言，他敢於睥睨古人，吐納中外，其器識固不同凡俗；就客觀方面言，他的革命事業發祥於二十世紀初葉之湖南，得天時地利之嘉惠，亦決非偶然。